

红旗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导 读

● 郑 惠主编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导 读

郑 惠 鲁 丁 著
杜 蒲 张 民 耕

红 旗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108 号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导读

编 著 郑 惠 鲁 丁 杜 蒲 张民耕

责任编辑 毛传兵 封面设计 秋 夫

出 版 红旗出版社 (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

印 数 1—25000 册

787×1092mm 32 开 12 印张 250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68-261-7/D·112 定价 4.50 元

前 言

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了。作为参加了这本书工作的一名成员，我就编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谈一点体会。这对于大家阅读这本书也许会有所帮助。

党的七十年历史，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七十年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的，总起来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第二件大事是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件大事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第三件大事现在还在做。这三件大事贯穿一条红线，即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当我们党把理论和实际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有发展，有成就；结合得不好，就要犯错误，遭受挫折。我们党整个七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曲折艰辛而又光辉发展的战斗历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就是通过党的七十年的历史着重写出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这样一条主线。

一、独立自主地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

民主革命时期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从这一结合中得出党的民主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是这本书前五章一个总的思路。其中前三章写的是从建党到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探索和开创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中曲折前进的历史。这一时期我们既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又犯了几次大的错误。同志们知道，这就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后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陈独秀和王明的错误使我们的革命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本书比较仔细地分析了产生右倾错误或者“左”倾错误的历史背景、社会根源及革命者认识上的根源，其中包括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影响。只有作这样一种分析，才能使我们切实地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到了遵义会议，党中央的领导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变了原来推行“左”倾路线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这以后，党就一直沿着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前进，我们的事业就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遵义会议后能够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与正确总结党的历史上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分不开的。

这本书在写我们党本身的这些失误、挫折及成功、胜利的发展过程时，还写了当时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同我们的关系。这一点在过去的党史书上很少写，这本书适当地写了，既说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帮助所起的积极作用，也说明他们的一些错误指导对我国革命所起的消极作用。我们党在处理这种关系中，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不能不受

到它多方面的影响。开始时我们有些党的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指导、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抱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照搬照抄，特别是王明担任党的领导人的时期，这种教条主义导致了大的错误。后来我们党总结了这些教训，对待外国党的经验能够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取舍，能够抵制他们的错误影响，从此确立了一条独立自主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的原则。这条原则的确立，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关系极大，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二、党是一贯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先锋队

这本书还比较注意写了我们党是一贯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党能够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两项任务很好地合起来，在这方面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本书注意写了党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特别是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说明在中国进行彻底的反封建的斗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为什么要着重写这一点呢？大家知道，前几年有些文章宣扬一种不正确的论调，说我们党没有能很好地领导反封建斗争，只是搞了救亡，而不注意启蒙，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或者说是救亡中断了启蒙。实际的历史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中国，最彻底的反封建就是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离开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单纯反对封建思想和文化，不可能彻底。只有把这个封建经济剥削的根子挖掉了，才能为政治上、思想上深入的反封建打下基础。事实上我们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在彻底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始终坚决地开展了反封建斗争，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是很大的。那种指责我们党不重视反封建的论调，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错误的。

三、党的统一战线等革命经验十分宝贵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也就是这本书写的第四、第五章，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取得光辉成就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得相当好、相当成功的时期。这两个时期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愈来愈成熟，能够正确地运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本书通过许多历史事件来写党的三大法宝这些重要的历史经验。拿统一战线来说，在这方面我们党积累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旧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两头小中间大。无产阶级的数量很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数量也很小。这两头只占人口的少数，而中间有着数量广大的阶级，这就是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我们党能否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在于能否把中间这部分数量很大的社会力量团结争取过来，形成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能否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根本问题。武装斗争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党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党教育、发动农民，把他们组织起来，通过实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这样三位一体的任务，充分发挥他们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作用。这样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有了这样一个工农联盟，我们就有了一个牢固的基础，才有力量团结更广泛的阶级、阶层，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对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某个时期，也有必要和可能与它建立统一战线。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汉奸以外，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我们都要将它们团结到统一战线中来。这中间就有一个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关系问题。这个统一战线

的经验在全世界的革命斗争中都是少有的。这本书在写许多历史事件时，既着重写了武装斗争的经验，也用力写了统一战线的经验。比如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这一残害新四军的严重政治事件，在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时，党中央很好地掌握了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用强大的政治攻势坚决有力地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同时又使斗争有所节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保持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从而赢得广大中间阶层的同情和支持，也得到美英苏等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这是党的统一战线史上很辉煌的一页。

四、全面写出战后争取和平民主到 被迫进行自卫战争的历史过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同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这本书写得也比较全面。过去对这个问题有的党史书写得简单了一些。好像国共双方都不是真正为了和平，都是用和谈来掩护打仗，谈判只是一种策略，历史的实际不是这样。蒋介石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直要消灭共产党和革命力量的，他是想用和谈达不到他的目的之后便发动内战。而我们党当时则是真心实意想实现和平的，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从当时的国内民心看，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渴望和平。党十分重视人民的这种意愿。当时国际形势是美苏也希望国共双方妥协下来。我们曾经估计蒋介石在国内外要求和平的压力下，也可能接受和平，所以才有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才有重庆谈判和政协协议的产生。按照毛主席在七大《论联合政府》中的设想，抗战胜利后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但政协协议规定设置的政府，比七大设想的国家机构的层次还要低一些。即使是这样，

我们党也真心愿意实现这个协议，愿意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达到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目标。但是蒋介石对我们党和人民这种真诚的和平愿望却完全拒绝、扼杀了，这就迫使我们党不得不选择战争的道路。而这一选择在局势变化后是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的，也体现了人民的要求。由于我们党对内战的危险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做了必要的准备，因而能够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及时转入自卫战争。近几年党史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我们这本书吸收了这些成果。

五、开创自己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胜利

第六章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七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这本书上说这是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篇章，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党在完成经济恢复工作，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关键时刻，提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对这条总路线，前几年在党史界、理论界有一些争论。涉及那些年社会主义改造到底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有必要，是不是太早了？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许多分歧。这一章在写这个问题时，将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包括国内、国外条件的变化，政治、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矛盾，社会主义改造经验的新创造，由此引起对社会主义改造步骤的新认识，当时主要领导人在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考虑，将这许许多多因素充分地分析清楚，说明当时我们党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抓住时机使工业化建设顺利地迅速发展，就必须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重大矛盾、重大障碍，就要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

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时候在党中央领导人的认识上，改变了过去以为要等较长一个时期（例如十五年）条件具备之后再一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看法，形成了现在就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看法，尽管如此，党还是准备用十年或十五年的时间实现这个过渡。这一决定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看起来的确是势所必至的，的确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我们党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把历史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书中比较充分地论述了它的伟大意义和成功经验。书中也讲到从1955年以后改造工作搞得过急、过快、有些粗糙，遗留下不少问题。即便是那样，如果以后能够冷静下来，实事求是，认真调查和调整，也是完全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好的。但是以后党的历史发生了曲折，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增加了许多新的问题。

六、“文革”前十年与“文革”十年 “左”倾错误的区别

第七章的题目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是八大以后十年历史发展的主题。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我们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就在探索如何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这一章的开始着重写1956年“八大”前的探索、“八大的召开”、“八大”以后一段时期的进一步探索。从苏共“二十大”，我们看到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教训，许多不成功的地方。而我们自己在前七年

也有种种经验教训，有做得好的地方，当然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在学习苏联经验时就有学习得不合适的地方。这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强调提出，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有独创性，要比苏联的路走得好一些。这一章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作为“八大”准备的《论十大关系》等文件提出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方针；“八大”的报告、决议及中央许多同志的发言，在确立了已有的新方针的同时又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八大”以后进一步的探索也有新的发展。总起来说，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对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些新观念新方针在理论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还不可能在我们党的领导层取得深刻的共识，不像在民主革命后期“七大”时那样为全党所接受。到了整风反右，以及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原来正确的东西未能很好地坚持下去，相反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走偏了方向。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在这十年中逐步发展。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发展，结果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从1956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中，两个十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八大”以后的十年应该说我们在奠定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积累经验和培养人才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文革”当然是完全错了，应该从总体上加以否定，但在“文革”十年中也还表现出党的生命力。前几年对“文革”前十年和“文革”十年我们党犯的“左”倾错误有一种说法，说这二十年的错误是一贯到底，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这种说法对二十年的历史不做具体分析，是不对的。事实不是

这样，“文革”前十年与后十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虽然同样是“左”倾错误，但错误的规模、错误的程度、错误的性质、错误的危害都很不一样。在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我们这本书也做了比较细致的区别和分析。

七、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发展趋向

在写党的八大以后十年的历史时，这本书特别写了三个时期：一是八大一次会议前后的时期；二是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八、九个月的一段时期；三是1960年以后五年调整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前面说的“八大”前后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后两个时期则是党在犯了错误之后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汲取教训。这期间我们党制定了一些好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在继续探索中又有一些前进。在错误趋向发展的同时，形成了另一种正确的发展趋向。这种写法同过去的一些党史书的写法不同。过去的党史书至少没有写得这样明确，这样清楚。本书的分析表明，在这十年的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这两种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探索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中。在毛泽东同志的认识发展中，就是又有正确的，又有错误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认识发展中，也同样是既有正确的，又有错误的。所以，不能说两种趋向就是以两部分领导人为代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好像一些同志是在错误路线一边，一些同志是在正确路线一边。“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完全颠倒是非的大批判，把刘少奇同志说成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而毛主席则是正确路线的

代表。“文革”以后的一些书，特别是国外的一些书，又完全倒过来，说刘少奇代表了一条正确路线，而毛泽东代表了一条错误路线。实际上“文革”前十年是一种很复杂的情况。在经济建设和在一些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同志他们比较务实，有许多正确的主张，而毛主席在当时把他们这些正确的主张当成右倾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有些问题，例如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上，可能是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都有正确的一面。在“文革”前十年中，有时正确的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错误的趋向比较占上风，但到“文革”开始的时候，的确是错误的趋向压倒了正确的趋向，因此便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文革”的错误与“文革”前的错误，是不一样的。但“文革”前的错误的的确导致了“文革”的发生。所以既要看到两个时期“左”的错误的区别，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

这本书还写明，“文革”前十年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并没有因“文革”的发生而被完全抛弃、摧毁，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在“文革”期间也还在起作用，只是不占主导地位。比如在十年动乱中一直还保持着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还能有所增长，这是与“文革”前制订的农业六十条在继续发挥作用分不开的。特别在“文革”结束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很快地拨乱反正，开创新的局面，显然是“文革”前的正确的发展趋向为此作了准备。正是因为能够很快地将前十年中正确的东西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所以在这时能够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把这两个发展趋向写好了，不但使“文革”前十年的历史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反映，而且使“文革”十年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后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历史能够得到完全合理的说明，使这几十年的历史成为可信的、

可以理解的了。

八、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分析

这本书写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些错误。除了写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外，还写了毛主席的带有“左”倾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当然，毛主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认识还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他的确提出了许多很有远见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有意义、非常宝贵的。比如他提出的反对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思想，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的思想。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很值得我们进行研究的。但是他有的确提出过一些错误的思想和主张，他在努力追求一种完美的纯洁的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本书写了主要集中在“五·七”指示中的这种构想。他在“五·七”指示和这以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以后的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构想。这就是试图建立一种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限制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组织。但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对这种空想主张的抵制和反对。他却认为这些不同意见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在他追求这种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努力中，遇到了严重的障碍。这种障碍在组织上的表现是在党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各个地方还有它的代理人。他想用一种不寻常的方法来扫除这种障碍，把他们统统打倒。于是，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

这本书在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补充了这样的内容。这个问题，在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没有多说，而在这本书中做了一些补充。通过这样的分析，使人们看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确不是由于个人的恩怨，也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党内的权力之争，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中央的领导人存在着意见分歧。毛主席把这种认识上的分歧的性质看错了。混淆了是非也就导致混淆了敌我。这样写，才能使人们知道，虽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对党和国家整个形势的估计，对党中央领导层的情况的估计，所采用的一些理论、方针、方法都是错误的，所以才使得“文化大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一次“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这本书也写到当时党内的认识情况，党和国家在制度上存在的缺陷，不能有效地抵制领导人犯这样的错误。

九、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家开始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本书的第九章写的就是这一段历史。这一章写了开始时的两年徘徊，又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意义。对两年徘徊时期的历史，作了比较公正的叙述。两年徘徊实际上也并不都是错误。这两年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在纠正某些“左”倾错误方面都取得过一些成绩，但在新时期到来时，华国锋同志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使他的领导不能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一是在政治上主张“两个凡是”，一个是在经济上搞“洋冒进”。“文革”结束

后，华国锋同志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革”同毛主席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既想要结束“文革”的某些混乱，又不想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有任何涉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他采取了从整体上维护“文革”的办法。他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主席晚年发动“文革”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党的优良传统。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华国锋同志的胆识和经验都很难处理得好。只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才把这样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既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同时又批评和纠正了毛主席的“左”的错误，使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伟大的转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两年徘徊，还在于它标志着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划时代的转折。是不是可以说，如同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那样，它实现的历史性转折，起到了非常深远、重要的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能够系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把“文革”前党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发展趋向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把正确的发展趋向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进行新的开拓，新的创造，经过党的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十三大）和多次党中央的全会，我们党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及如何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能够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前进，使这十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当然在这十多年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赵紫阳同志都犯了错误。这本书写了当时中央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他们来担负党中央的重要职务的，后来他们又是因为什么犯错误，犯了什么错误而离开了总书记的岗位

的。与以往“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处理党内问题不同，在进行这两次党的高层领导的人事变更中，我们党能够比较顺利、稳妥地解决问题，使我国的形势很快地稳定下来，并且能够从这些问题的处理中总结出新的经验教训。比如在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能放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能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工作，等等。

总起来讲，建国后四十二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确是不平坦的，是曲曲折折地发展的，一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又犯过多次错误。经过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我们党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全国人民能够继续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大步前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一直到最近召开的七中全会，全党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已经取得共同的认识，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已经将这条建设道路概括为十二条原则。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七十周年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原则。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更有信心沿着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本书的结束语对这一段历史作了一个简要的总结。结束语的最后说，七十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以后，只要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达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一定能最终实现。

郑 惠